



张自烈与《芭山文集》的流传

方子昭 (江西南昌市图书馆)

张自烈系江西籍的一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、学者,其著述之丰,世所罕见。由于清代焚书坑儒式的文化禁锢,其原著大多流行不广,传世甚少。其生平事迹在《清史列传》、道光《宜春·县志》等史料上仅有简略的记载。本文仅就浅见所及,拟补其遗漏。为有利于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,希望更多的人知其人,读其书,诵其文。

一、张自烈生平

张自烈(1597~1673年),字尔公,号芭山,江西宜春北厢上水关人(今袁州区秀江街)。明末南京国子监生。从小喜读书,博学广闻,酷嗜藏书。33岁时竭尽家中所有钱财,访购“书三万六千卷有奇”,多明人文集。1634年将所购书籍全部运回老家,放置于郡学,以供学子共享。崇祯初年,礼部尚书姜曰广推荐于阊门执教,名声大震。崇祯六年,在南京与方以智结识,共同成为复社魁首。方以智明末清初画家、哲学家、科学家、“明季四公子”。顺治十三年(1657年)方以智有贺自烈六十寿文。

张自烈身处士风矫激、个性张扬的晚明时代,广交游,重名节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自烈与社友多人联名发布《留都防乱公揭》,声讨“阉党”余孽阮大铖的罪恶。后来阮大铖得志报复,因而被列入黑名单《蝗螭录》。其所著《四书大全辨》,清准刻印,卷首开列的“参订者”名氏达472人。知交吴应箕、陈贞慧、沈寿民、方文、顾杲、侯方域、沈耕岩、夏允彝、黄宗羲、冒襄、钱吉士、扬廷枢、方以智、李清、吴伟业、扬士骧、袁继咸、扬廷麟、陈弘绪、万时华、陈允衡、揭重熙等几十人,均为复社风云人物,一代盛名之士。旅居金陵二十年,四方书牒积至数万件。由此可见,其交游之众,声气之盛。

张自烈交结师友多以政见相同为前提,择人而交,不泛结识。对待同道同志,推心置腹,一腔热血,尤其危难之际更见风义。崇祯七年(1634年)袁继咸受诬被逮,他冒风雪奔走数千里,赴阙为之讼冤。顺治三年(1646)袁继咸遇难,又为之刻印遗集和作序。袁继咸明代大臣,字季通,号临侯,江西宜春袁州人。袁山(袁继咸)、文山(文天祥)、叠山(谢枋得)并称为“江右三山”。在抗击清兵的入侵中,袁继咸是富有民族气节而又值得称道的官吏。他被俘入狱后,不食清餐,不着清服,拒绝剃发,也拒绝朝见清帝。他仿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而作《正性吟》,死不降服,最后在清兵的屠刀下英

勇就义。后人将其生前著述整理编为《六柳堂遗集》。又如:吴应箕抗清而死,张自烈倾产为之刻印遗稿。吴应箕,字次尾,号楼山。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、文学家、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。其性刚傲、耿介、执著,才思敏捷,文笔激昂犀利,“尤工策论”,鞭辟入里,切中时弊,著有《楼山堂集》、《读书止观录》,其言论风旨为时人所重,影响深远。张自烈对性情不契,或认定对方心术不正,哪怕是大名士、老同乡,他也避之唯恐不及,甚或反目大肆讥讽,不做八面讨好的“乡愿先生”。例如,对待黄道周、周钟,即便是挚友,但凡事关是非,他也不肯分毫迁就,必明辨而后,以持守其“严气正性”。明亡,自烈不愿做贰臣,清政府“累征不就”,以明遗民自居,潜心隐居,著书讲学。好评选文章,善诗古文辞,尤长于考辨。据笔者《张自烈著述考》一文统计,书名题为“辨”、“批评”的多达43种。晚年应南康知府廖文英之聘,主讲庐山白鹿书院,门生众多。至逝世。

1983年,为纪念张自烈,宜春县政府把他的祖居地——水上关,命名为“芭山路”。

二、张自烈著述

张自烈的一生著述数量之多,世所罕见。著述内容极其广泛地涵盖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著有《钦定四书大全辨》三十八卷附录六卷、《字汇辨》十二卷(后改《正字通》)、《芭山文集》三十三卷、《四书诸家辨》、《大学衍义辨》、《四书辨注》、《古今理学辨似录》、《诗归辨》、《古诗文辨》、《程朱遗书语类合辨》、《批评圣学格物通》、《批评东皋子集》、《批评朱晦庵集》、《批评二程全书》等数百种行世。但存世者寥寥无几,见于史乘及公私簿籍记载,著录的也仅数十种。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、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、《清史稿·艺文志补编》均不录其书。《国史经籍志》史部录1种;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录2种;《清代禁毁书目》、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录1种;《贩书偶记续编》^①卷十九、《清史稿·艺文志拾遗》^②、《振绮堂书录》^③、《持静斋书目》^④、均录《与古人书》二卷。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^⑤卷二十录1种。

历修地方志书目中,《西江志》^⑥仅录1种;民国《江西通志稿》^⑦录39种;道光《宜春县志》^⑧录最多为41种;以上诸录,除去重复,著录张氏书总共43种。现笔者通过搜讨多种文献,稽考梳理出张自烈的著述一百二十七种。另撰文《张自烈著述考》上、下篇,可供读者参考。

在现存的著述中,其编纂的字书《正字通》,共收录33179字,全书12卷,依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排列,部首与梅膺祚《字汇》相同,皆为214部。《正字通》是为匡正《字汇》的缺点错误而作。如张自烈在《正字通》凡例中所指出:“阙者增之,误者正之”。“旧本有字画讹省者,有非古文以为古文、非俗字以为俗字,有字同训异、字异训同者,有前后注重复、自矛盾者。其间援证失伦、真贋错互。”(旧本指《字汇》)^⑨。清代张玉书、杨廷敬等人奉敕编纂的《康熙字典》,就是在《正字通》与《字汇》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。迄今为止,《正字通》不仅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特别的研究价值,而且在中国字典史上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。其它《钦定四书大全辨》、《芭山文集》、《四书诸家辨》等存书均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。

三、现存《芭山文集》的流传

《芭山文集》是张自烈众多撰著中的一部。顺治元年(1644年)最初辑刻,虽未完工,却已流传民间^⑩。顺治七年(1650年),在宜春老家将刻成“完书”,自烈忽然伤其一生“颠隤至此,空言何补”,“一夕仰天拂渭,举凡未梓者悉焚去。存若干卷,藏于家,仍署《芭山文集》”^⑪。康熙二年(1663年),再寓南京,“以感事,命家僮焚版代炊”,即原先刻成携带到南京的书本也化为了灰烬^⑫。《芭山文集》现有清初刻本三十三卷^⑬、清康熙二十六年俞王爵刻二十四卷^⑭、清陈绅抄十九卷本^⑮、豫章丛书(胡思敬辑)二十三卷^⑯四种版本存世,但无论何种版本,都不是“完书”。清初刻本凡例云:“是集初本二百卷,盖皆及门后先私辑录者,先生复加厘定,凡羽翼风教、匡救国俗、与经史相发明者存之,余悉删去。”^⑰存世本仍然记录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史料,如《与江督袁临侯书》纵论南明时政大计,《上论官兵四蠹书》揭发官兵借剿寇之名掳掠乡里、屠杀百姓的罪行,《与同人书》记录十位复社人物的活动和彼此的恩怨,《骑射议》论列明典章制度的弊害,《厄记》、《旅记》等记录作者謁蹶乱世、历险兵间等。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说,《芭山文集》是一部可以信赖的史籍^⑱。

在《诗集》^⑲中,仅存诗38首,多写国亡家破之痛及故旧零落之情。如《南樵暮春即事》:“数年祇被住他乡,又见流光过短墙。草睡不思春老大(原注:林有睡草,见之,则令人睡。见《述异志》),花飞浑似客疏狂。白云过眼愁千里,青史随身影半床。人事凄凉肠欲断,歌成何处濯沧浪”感时伤乱,一如其文。

又如《怀夏彝仲》为自烈怀念著名抗清志士夏允彝而作,诗云:“今日何所思,思君君已去。不恨道路长,恨君别我遽。假寐忽逢君,苍黄与君语。未知君梦中,相逢竟何许!”夏允彝(1596~1645年)字彝仲,“好古博学,工属文,暇时偶作印章”^⑳。清兵进攻江南,夏允彝与陈子龙等起兵抗清,兵败,于1645年9月17日投水殉节,时年50岁,死后谥“忠”,著有《夏忠公集》、《私制策》、《幸存录》等。夏允彝的文学造诣和民族气节和陈子龙齐名,世称“陈、夏”。这首诗倾注了自烈真情至性的情感,如泣如诉,九曲回肠,那悠然不

尽的韵味,朴实生动的语句,令阅者动容。从文学的角度来看,自烈为文好议论而不注重描写,其议论不随人短长,具有独特的眼光,张舜徽先生称:《芭山文集》是一部于人可称,于文可观的著作,在清初遗民文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^㉑。

清初刻本,列目为三十三卷,其中有二卷未刻,实为三十一卷。此本中,凡“夷”、“虏”之类忌讳字样都被剔除,留下墨丁。在俞王爵刻二十四卷本中,删削改易之处,比比皆是,有的篇章完全改得面目全非。即使如此,该版本在乾隆修四库全书时,仍被列入《军机处第一批奏准全书》清单,打入四库禁毁书之冷宫(见照片),以致于民间鲜有子遗。所幸的是民国胡思敬,根据宜春张氏后裔“家藏原稿本”,比对应王爵刻本增删补录之后,收入《豫章丛书》(见照片),《芭山文集》才得以流传至今。

由于书被焚毁的缘故,其生平履迹亦因之湮没不彰。同治《袁州府志》^㉒中《张自烈传》被挖版留墨,残文不成篇章。道光《宜春县志》^㉓卷二十三记载:“南康知府廖文英与自烈为性命交,葬于(白鹿)洞左青龙山,题其碣曰:清故处士张芭山之墓。”仅寥寥数十字。《清史列传》^㉔第十七册《张自勛传》中附“兄自烈,字尔公,博物洽闻。与同里袁继咸善。继咸为山西提学,遭诬获罪,自烈上书讼其冤。后继咸督师江上,招自烈为助,不赴。明亡,隐居庐山,累征不就。年七十七岁卒。著有《四书大全辨》四十卷、《正字通》十二卷、《芭山文集》。”

从上述的简略生平及《芭山文集》的流传,可见清代焚书坑儒式的文化禁锢,及专制淫威下因忌毁书,因书毁人,竟到如此地步!在那种动乱窒息的年代,曾撑住江西斯文的人文代表之一的张自烈,其著述等身却传世甚少之缘故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注释:

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《芭山文集》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,清初刻本。

谢国桢: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,中华书局,1964年,卷5,引张鉴《书〈复社姓氏录〉后》。

《芭山文集》卷十二《六柳堂遗集序》

(清)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二七七,中华书局,1974年。

《芭山文集》卷二二中《再告吴次尾文》。

⑳ 张为之等:《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。

(明)焦竑:《国史经籍志》史部,续修四库全书影印,明刻本。

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,明崇祯十三年石啸居刻本。

(清)姚觐元:《清代禁毁书目》,商务印书馆,1957年。

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,孙殿起辑,商务印书馆,1957年初版。

(下转第187页)

是有明确记载的九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动迁。

据水文资料统计,1931、1949、1954三个年份,九江最高水位分别达20.53米、20.09米和22.08米,均造成城区80%以上陆地被淹,危害之大,可见一斑。

令我们不能忘记的是1998年的世纪大水。是年,因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影响,我国大气环境变化异常,造成长江流域大范围持续降雨。8月1日23时,九江水位达到23.03米,超警戒水位3.5米,超历史最高水位0.83米。8月4日江新洲决堤,8月7日九江长江城防大堤4—5号闸口之间被冲开了60米的决口。一时间,险象环生,这是一次九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水灾。时间之长、范围之广、来势之猛、危害之大均为历史所罕见。

说起治水,在九江不能不提到城区中央的两湖,它是一道令九江人自豪,外来者羡慕的城市美景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织一起,使两湖成为了九江的地标,将其喻之为城中有水,水中有城,再贴切不过了。据方志记载,该湖唐以前名曰“景星”。随着城市的东迁,湖与城的方位发生了变化。唐以后,因湖位居城之南,故改名“南湖”。然则,这之前的湖只是大自然的造次,与人挨不上多大关系。李勃任江州刺史时,为便于周边民众往来交通,兼及水利需要,于湖之中修筑长堤一条,将湖一分为二。于是,湖被赋予了人文的精神色彩。长堤之内称作南湖(清代九江府城在此开有南门,后代九江人习惯将南湖叫做南门湖),长堤之外称作甘棠湖。“甘棠”者,本亦植物之名,如何与九江的湖水联系在一起呢?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寻找答案。《诗·召南》有《甘棠》篇。朱熹集传中说“召伯循行南国,以布文王之政,或舍甘棠之下。其后人思其德,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。”后世因用“甘棠”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。这里说的很明白,为官者只要想着人民,多办好事,实事,人民是不会遗忘的。

在九江,耳熟能详的与水有关的故事,不仅是甘棠湖,还有如思贤桥、烟水亭、锁江楼等等。说到这里,我们不能不提到城区内的“龙开河”,这条发端于瑞昌青盆山的“溢水”

和我们相伴了几千年,于近世消亡了。历史上它不仅是船民渔夫躲避狂风巨浪的天然避风港,也为九江经济、贸易活动发挥过一定的作用。虽说“布帆木桅”的时代行将过去,但这条河留给城市的文化却永远存在。九江古称湓口、湓浦,即为湓水之口的意思,浦,河之岸也。这些与水有关的遗迹、故事、传说,未必都与史实相符。但至少它留给我们的是一段段、一件件美好的精神财富。如果把这些财富化作一种向上的城市精神,它带给我们的必将是一种奋发有为的不竭动力。

水给我们造福,水也带给我们灾祸,这是九江几千年用水、治水的生动写照。尽管历代治理者和民众与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,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,治理水患,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。从《中国城市防洪概览》一书中我们了解到,1966年以前,九江市区是一个没有堤防的城市。1966年,国家投资340万元,在九江兴建防洪大堤,从此拉开了九江堤防建设的序幕。经过长期的努力,兴建长江大堤18800米,赛湖隔堤1600米,内湖堤14600米,建造通道闸58座,涵闸24座,排涝泵站4座。1983年后,九江再次对堤防进行整治。到1994年,城区长江堤防整治达标(25.25米高程)8874米,除险堤段4100米,扩建排涝泵站2座,新增临时排涝站34座,整治达标涵闸、通道闸45座,城区保护范围扩大到45平方公里。

说起这座与水相伴相生的城市,令人欢欣令人忧。欢的是它曾带给我们繁荣、富裕。文化名人汇集,行商坐贾涌至。开文化之先河,过先儒之教化,领财源之茂盛。因水而兴的九江码头经济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它是九江历史上繁荣的原驱力,对其他行业的崛起和兴盛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。也许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,形成了九江海纳百川的包容性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

(上接第192页)

⑪《贩书偶记续编》卷十九孙殿起录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。

⑫王绍曾:《清史稿·艺文志拾遗》,中华书局,1980年。

⑬王远孙:《振绮堂书录》,旧抄本。

⑭(清)丁日昌:《持静斋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。

⑮、⑳谢国桢: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,中华书局,1964年。

⑯(清)白潢:《西江志》,清康熙六十年刻本。

⑰吴宗慈等:民国《江西通志稿》第四十二册,江西博物馆1985年整理本。

⑱(清)程国观修:道光《宜春县志》卷三十二,清道光三年刻本。

⑲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经部197~198《正字通·凡例》。

⑳、㉑柯愈春: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,第23页,北京,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。

㉒张舜徽: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。

㉓(清)骆敏等修:同治《袁州府志》(六),清同治十三年刻本。

㉔(清)程国观修:道光《宜春县志》卷三十二,清道光三年刻本。

㉕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第十七册,中华书局,1987年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